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许明 主编

先知的足迹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程伟礼 张生泉 吴小龙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K827.6
148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20100665 许明 主编

先知的足迹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程伟礼 张生泉 吴小龙 著



201006650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先知的足迹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程伟礼 张生泉 吴小龙 著

责任编辑 袁敏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社世界军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250 千字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215—03653—7/G·515

定 价：16.00 元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许 明

河南人民出版社组织的这套大型丛书接近完成的时候，将是本世纪的最后一二年了。作为编者，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我们有了一个机会在充满风风雨雨的百年中国的一个转折点上，回顾和展望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艰辛的然而又是十分辉煌的路程。

应当说，在20世纪剩下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力图全面地在思想、学术、理论上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足迹，特别是近百年来，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动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探求他们在推动历史进步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是十分适时的。这不仅仅因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过去在理论上缺少相应的研究，从而削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认定和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而且也因为，我们深信，这项系列工程的展开是对百年中国文化运动的一次自觉的反省和展望。

“五·四”以来，苦难的中国在各种阵痛中终于迈开了向现代化前进的历史步伐。然而，或许是我们这个民族因袭的历史包袱太沉重，或许是客观的社会条件不允许，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路途，特别艰难和漫长。在这个过程中，一切进步的、爱国的、民

DK21/388

族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力图体现历史要求的同时又啮咬着自己的灵魂，急匆匆地锻造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历史没有准备一个成熟的经过现代社会洗礼的知识群体，恰恰相反，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背负着责任，探索着前进的。而 80 年代，所有这些内在的矛盾：历史要求与知识准备、文化传统与社会批判、政治理念与大众心理……都充分地暴露了出来。知识分子的敏感心灵又一次经历了深刻的洗礼。

在这个复杂的历史变动中，中国知识分子选择的改造落后和分裂的中国的社会工程获得了初步成功——尽管经历了深重的坎坷和曲折。然而，与“推翻旧世界”的历史任务不同，80 年代所提出的历史要求是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建设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中国。所以，80 年代文化与社会的变化、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矛盾和困惑，对所有真诚的知识分子来讲，也都是全新的课题。

在沉重的历史负荷面前，素有“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能无动于衷的。《中国知识分子丛书》将为有志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学者提供机会，研究在历史变革中知识主体的思想轨迹与社会功能，研究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心灵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历程。从而在更深的层面上研究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担当起这套丛书编辑任务的是一群 40 岁上下的中青年学者，其中大多数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经历过“文革”以及 80 年代的开放改革，与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思想上的种种动荡和痛苦的反复。然而，他们执著地求索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理性之路。有了 80 年代那段特殊的经历，就如他们的年龄所标志的那样，在思想上开始走向成熟了，对现代中国来讲，一种沉稳的理性比之激情更为需要。清理极为复杂的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路程，提高到学术理性的层面上去认识一个社会文化的载体

——知识者的社会价值与功能，是建设新文化所急需的。由此，本着“开放、求实、建设”的精神，我们祈望一切关怀当代中国命运的朋友们支持这项事业并提供意见，惠赐佳作。

到本世纪末，8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中青年学者将进入“知天命”之年，然而，有什么能比参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建设更能激起生命的热忱呢？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完成什么，但重要的是他们在做什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是为序。

1992年6月6日于北京钟鼓楼

序

吸引我们三个不同专业的人走到一起来追踪先知的足迹的，主要是对于中华民族、中国社会未来命运的一种忧患意识。因此，追溯一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经历过的心路历程，从本世纪思想上影响最大的这一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足迹中，寻觅一种精神力量和思想启迪，对于坚定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念，也是很有裨益的。其实，即使不以文字表述出来，这一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心里经常在思考的时代课题。这是一个颇有兴味的问题，以致于我们在写成本书之后的兴趣要比动手写之前的兴趣更为浓烈。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也只是一种“遗憾的艺术”，我们的感觉中总有那么一种“意犹未尽”、还需要继续研究的体验。然而，任何研究总不可能是完美的，留一些问题与缺憾，也许更能激发我们今后的努力。

可以说，中国的 19 世纪是中国人受屈辱、甚至是忍受奇耻大辱的时代。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心血史。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在这段历史面前，都会产生一种义愤和反抗的心绪。中国的 20 世纪是中华民族历史发生巨大转变的时代。在这个世纪中，也产生了一些杰出的领袖人物，领导中华民族奋起斗

争，不断走向民族振兴。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是一个伟大的先知者，中国现代化的第一张蓝图最早是由他设计的。他是在中华民族衰落到谷底的 19 世纪末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面对列强瓜分的民族危亡局势，孙中山把他建立的革命团体称作“兴中会”，是有着深刻的涵义的。从此，“振兴中华”这一口号，成为整个 20 世纪唤起、激励、凝聚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精神。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他的三民主义的宝贵价值。毛泽东在对中共“七大”报告作口头解释时说，我在报告里尽量把孙中山的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① 按照我们的理解，这里毛泽东所提出的要“抓住死也不放的”，不仅是孙中山这面旗帜，而且应当继承“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主义中的合理因素，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一孙中山未竟的事业。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初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使中华民族从政治上站立了起来。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不可能如此迅速取得成功。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有效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从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孙中山“知难行易”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民生主义的现实内涵，同样也可以感受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本来内涵的正确命题，当然更多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开拓创造。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直到邓小平，构成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脉相承有机联系的各个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和具体环节，而贯彻其中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动力则是：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

^① 《党的文献》，1993 年第 6 期。

主义，这同样也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

唯物主义在现代中国的理论形态，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从清代朴学转化而来的“经世致用”学风，深深地影响着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由西方引入的科学实证精神与中国“经世致用”传统相汇合，又演化成崇拜科学的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这股思潮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对于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洗刷了唯心精神，引起了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这两个革命从文化价值观念与文化载体两个层面进行革新，从而使中国文化发展出现了一种历史性的根本转化，同时也造成一定程度和一段时间内的文化断裂。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理性飞跃表现为妇孺皆知的“实事求是”命题。“实事求是”，在当代中国成为“解放思想”的近义词，从而生发出感性的诗意图辉，成为使现实发生巨大变革的重要理论武器。

爱国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具体内涵体现为两大目标任务，这就是反帝反封建，对外抵御外侮，对内争取民主。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华民族有个梦，这就是结束四分五裂的状况，实现祖国统一，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摆脱贫困走向强盛。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政治上站起来了。然而，国际上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海峡两岸人民对统一大业的企盼以及对民主政治的企盼，说明我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必须把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统一放在首位，把我们国内的事情搞好。当前，坚定不移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都成为关涉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是使现代中国摆脱被外国列强欺凌奴役，使当代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繁荣昌盛的唯一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道路是现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集体的又是自觉的历史抉择，它也是当代

中国 11 亿人走向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和核心是“共有”与“大同”，这是从先秦诸子百家一直到宋明理学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理想目标。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既认同于中国人深层文化心理的价值取向，又是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共同的长远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谁引导全体人民实现这一理想目标，谁就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不可能逆转，即使有过曲折路程，也仍是人心所向。这正是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一种历史传统、文化基因和民族特征。当然，这种社会主义观念有别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是建立在科学、民主、文明、富裕的时代精神之上的，又是最能实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与体制。这种社会主义的新体制、新模式，前无古人，是与唯物主义与爱国主义紧密相联系的。这种社会主义正处于实践探索过程之中，然而却已经表现出蓬勃的生机、深刻的内涵和远大的前途，为世人瞩目。

无论是从科学实证精神到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发展，还是从追求民主、追求民族独立到追求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操发扬，或者从摆脱贫困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进取，都离不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思想影响。他们的足迹，实际上也就是唯物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中国的发展轨迹。在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拼搏奋斗中，形成了一种精神、一种风范和一种品格。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误；有欢乐，也有痛苦；有收获，也有失落；有探索，也有模仿。越是研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我们越是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与他们的联系密切。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行动规范，我们这一代人的言行始终仍在这些思想巨人的影响之下，或多或少地继承着他们的遗传基因，不知不觉地重复他们所面临过的问题与境况。这主要是因为

我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相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相近，所追求的目标一致，所以认真解决任何一个问题必须从头开始，从根本上着手。历史的发展外貌可能是跳跃的，然而思想的发展是合乎逻辑的程序，必须是理性的，循序渐进的。前人留下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想课题，一个也无法回避。前人留下的不只是思想遗产和精神财富，而且也留下了一系列课题和需要一一着手解决的问题。作为承上启下下一代的我们，没有理由偷懒，不能够不负责地将前人留下的问题毫无建树、毫无发展地推给我们的后人与下一代。这个时候，的确需要一种“鲁迅精神”，用自己的肩膀抗拒沉重的传统的闸门，让我们的下一代少承受一些传统的包袱，让他们到一个更为民主、更为富裕、更为自由、更为文明的新天地中生活。

在重新考察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瞿秋白等第一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中，我们极其强烈地体验到这种历史的使命感、社会的责任感以及时代的紧迫感。面对先知们留下的巨大的足迹，我们不得不重新回顾自己的短暂的人生历程，不得不重新界定自己的价值目标和人生取向。换句话说，先知们的思想、精神，至今仍能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灵，改变我们的某些思路，进一步端正我们的人生方向和奋斗目标。这种收获，决不是阅读一般书籍所能感受的。我们决不遗憾我们没有赶上先知们所遭遇的历史巨变的时代，因为我们正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之中，我们可以同样与前人们一样大有作为、大展身手。我们缺少的并不是智商，而只是胆魄与见识，更重要的是那种“处于死地而后生”的拼搏精神和献身精神。其实，真正的科学的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恐怕更加需要这种献身精神。

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世纪。如果这句话有一定道理的话，只是讲中国社会科学开始进入与西方社会科学

平等对话的时代，经过相互批评、相互诠释，而融汇成一种全人类适用的价值观念体系，凝炼出一整套真正的“全球意识”和世界哲学。那么，面对这种东西方文化融汇发展的趋势，未来的社会一定是多极世界、多元文化各呈缤纷异彩，然而不会没有竞争，不会没有“显学”与“主旋律”，只是“各领风骚”若干年而已。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具有这种健康的文化心态。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最早知道马克思的中国人	(1)
一、孙中山最早知道马克思	(2)
二、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	(7)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拓荒者	(12)
第二章 痛苦的先知者：陈独秀	(19)
一、独立精神与反叛性格	(20)
二、“民主第一”精神与家长作风	(30)
三、科学实证精神与反传统倾向	(45)
四、社会主义思想与二次革命论	(55)
五、取消主义思想与对民主的企盼	(66)
第三章 诚挚的先知者：李大钊	(74)
一、莽莽神州，至竟无一完人	(75)
二、除道义外，一切事物皆嫌过多	(90)
三、梦幻的“第三种文明”	(102)
四、向着终极目标勇敢逼近	(116)
第四章、渊博的先知者：李达、李汉俊、陈望道	(129)
一、做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还是理论家	(130)

二、献身正义，魂系申城还是江汉………	(142)
三、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徘徊还是在畅游………	(155)
第五章 悲情的先知者：瞿秋白………	(165)
一、从“忏悔的贵族”到“东方稚儿” ………	(166)
二、大革命风雨中的“江南第一燕” ………	(185)
三、文化战线上的艰辛开拓………	(213)
四、并不“多余”的《多余的话》 ………	(225)
第六章 沮丧的先知者：张国焘………	(231)
一、无政府主义的感召，社会主义的启蒙………	(232)
二、似醉似醒的理论，亦忧亦喜的心态………	(243)
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职务与素质的反差………	(252)
四、军阀逻辑的专横，抗拒正义的沮丧………	(257)
第七章 新一代的先知者：毛泽东、蔡和森、 邓中夏、恽代英、周恩来………	(266)
一、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267)
二、湘江的情，塞纳河的风………	(275)
三、工人运动的秀才，社会改革的先锋………	(281)
四、青年团的良师，革命者的响导………	(287)
五、“敬业”的心，“觉悟”的人………	(293)
跋………	(302)

第一章 最早知道马克思的中国人

中国人最早接触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借助于西方人的间接介绍而开始的。从王韬的《普法战纪》算起，中国人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零星接触到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西国近事汇编》的出版，使中国人知道了欧美各国中与统治者相对立的另一种理想世界和力量，这就是“康密尼党”、“康密尼人”（英文 Communist [共产主义者] 的音译）。1899 年 2 月起，上海《万国公报》刊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译、中国人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书节录，其中多次提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由于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刺激，生机蓬勃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康有为的心田中播下种子，他的《大同书》可视作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人中的一种反应。然而，政治上保守的康有为仍然走不出旧思想的藩篱，他的“太平大同”之道仅在于“破除九界”，而落到实处，只不过是“男女皆平等独立”，夫妇婚姻之事“只许订岁月交好之和约”而已。社会主义的龙种在康有为那里却只收获了跳蚤。

然而，西来的社会主义思潮却如巨大的磁石一样，持久地吸引着许多中国人去思考、去实践……

一、孙中山最早知道马克思

在探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之前，应当首先了解一下最早知道马克思的中国人，可能他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介绍，却是造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前提与条件。

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不完全资料来看，孙中山可能是中国最早探讨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也是中国最早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人。被人们誉为最早在中国以文字探讨社会主义、介绍过马克思的梁启超，他说：“孙逸仙（文），他不是个学者，但眼光极敏锐，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① 美国学者 M·伯纳尔在《1907 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一书中，说到“孙中山在伦敦研究过社会主义是毫无疑问的。”^② 另一位美国学者史抉龄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也说道：“他大概还研究了马克思、乔治·穆勒、孟德斯鸠以及其他。另外，他还进行了大量的个人接触，包括一些俄国政治流亡者。”^③ 宋庆龄也多次讲到：“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工人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产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期间，开始萌发了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他还没有能够区别马克思、恩格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西方某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所主张的社会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② 伯纳尔：《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第 39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③ 史抉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 11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主义。尽管如此，他心里已逐渐明白，资本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① 虽然没有直接史料，但有许多间接史料证明，1896年9月至1897年7月孙中山在伦敦期间，知道了马克思并探讨和研究社会主义。

1903年12月孙中山给朋友的信，是我们所看到的孙中山最早提到社会主义的文字：“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并有大冲突，以趋剂于平均，可断言也。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恶，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②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之所以能写出大谈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文章、讲稿，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有过深入研究的结果。但是孙中山只是在主观上对社会主义产生好感，而没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自觉接受者。加上当时欧美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派别杂然纷陈，孙中山识别不了真假社会主义，也服膺不了马克思主义。1895年9月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孙中山漫游欧美诸国，这时他的政治思想结构在这次欧美之游中发生了激烈的震荡和改组。他想以欧美为前车之鉴，既步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后尘，又要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不均、劳资对立的弊病，从而形成了他的社会革命、民生主义亦即主观社会主义的最初设想。他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平均地权。然而，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他的资本主义思想一样，存在着理念与情感之间的矛盾，其中既有对劳工同情的思想感情，同时却又缺乏科学的理性信念。孙中山曾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完全社会主义家”。虽然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不是科学的，难免带有空想的成分；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采取赞赏的态度，并且

① 《宋庆龄选集》，第537页，第370页。

② 《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第32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